評 *Becoming Taiwanese: Ethnogenesis in a Colonial City 1880s-1950s*

張毓芬
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Becoming Taiwanese: Ethnogenesis in a Colonial City 1880s-1950s. By Evan N. Dawle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426 pages.

台灣的民主化與中國的崛起，大約同時發生。因此，從 1990 年代以來，從各方各面來定義「何為台灣」、尋找台灣的認同、定位台灣在世界的角色與位置、透過新南向政策來強調台灣與東南亞之間的連結，已經是台灣（乃至中國）官方與學界最急切的任務之一，尤其是社會科學、台灣史、台灣文學等領域。關於台灣認同與台灣民族主義的問題，台灣學界的相關研究已經相當成熟：不僅對經驗現象有堅實的分析，也根據經驗現象發展出與西方理論對話的本土觀點；台灣以外的學者，包括著名的日本學者若林正丈、美國籍的 Leo Ching 以及愛爾蘭裔學者 Benedict Anderson，都曾提出各自的觀察。同情台灣的 Anderson 甚至將台灣認同歸類為 Creole nationalism，儘管台灣學界對此反應冷淡。

本書 *Becoming Taiwanese: Ethnogenesis in a Colonial City 1880s-1950s* 是國外歷史學界對台灣認同的最新研究成果。作者 Evan N. Dawley 在進入 Goucher College 歷史系之前，曾經在具有情報性質的美國國務院歷史文獻辦公室（The Office of the Historians，the United

台灣社會學第 40 期（2020 年 12 月），頁 235-239。DOI: 10.6676/TS.202012_(40).14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工作。本書主張：由於清朝、日本、國民黨接連三波的殖民政權——尤其是日本政權——都將台灣島民排除在政府之外，並根據語言、血統、習俗來定義「台灣人」，因此台灣人認同是台灣島民先後與日本民族主義、中國民族主義互動的過程中所發展出來的族群認同。這種族群認同有兩個特徵。首先，它是一種與國家無關的「非民族」認同（nonnational identity），是台灣人將「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逐漸區分開來的過程中形成的。其次，它也是現代的、城市的認同：儘管日本、國民黨都視台灣人為落後、野蠻，但是台灣人卻堅持自己是擁抱公共衛生、科學方法、理性。作者認為，二二八事件之所以發生，正是因為「台灣人」認同已經在日本時代發展為穩固而且與中國分離、必須保存的族群認同，因而不可避免地與國民黨透過再漢化運動所強加的中國人認同產生衝突。

為了支持上述論證，作者選擇日本殖民前夕至日本投降後的基隆港，並以有別於傳統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的後現代「展演認同」（performative identity）取徑，分析六名基隆港的菁英透過其所組織的各種文化、經濟、社會救濟事業中所展演的台灣人認同。作者認為，這六名菁英扮演了守門人的角色，在台灣人、日本人、中國人的界線中不斷穿梭「巡邏」，建構了台灣人的族群認同，而基隆港由於有日本時代全台灣人數最多的日本社群，又是二二八事件受害者最多的地方，因此最能彰顯出台灣人與日本人、國民黨政府之間的互動以及以彼此為對象的認同展演。這六名菁英是基隆顏家的顏雲年、顏國年兄弟，台北州州協議會員的許梓桑、近江時五郎，以及與顏家關係深厚的日本籍社會事業家兼實業家石坂莊作、木村久太郎。這六人之間彼此關係深厚，以基隆礦業為基礎，勢力橫跨政界與商界，並在發跡之後涉足文化活動與社會事業。作者分析的組織包括基隆同風會、基隆商工信用組合、基隆庶民信用組合、基隆博愛團、基隆公益社、基隆社會教化聯合會、台灣文化協會、社會事業協會、社會事業大會等，運用的資料則包括國史館台灣文獻館、中研院近史所與台史所的檔案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

以及朝日新聞、大明報、國聲報、聯合報、民報、新高新報、社會事業之友、台灣協會會報、台灣民報、台灣日日新報與中央日報。對話的文獻除了民族主義的理論之外，也包括散落於各章的討論，例如陳其南與李國祁對「內地化」與「土著化」的辯論、去領地化（de-territorization）與再領地化（re-territorization）之間的張力，以及東南亞華人的研究。此外，由於作者的國務院背景，因此也使用了一些國務院的政策報告。

作者分析的對象相當明確，同時作者設定的讀者群顯然是對台灣不瞭解的英文讀者。全書分七章，外加導論與後記，總共 426 頁的篇幅，資料分析相當仔細。在導論之後，第一、第二章討論基隆港的歷史、建立的過程以及基隆港在清朝、日本時期扮演的角色。作者所聚焦的六名台籍、日籍菁英以及他們在基隆所建立的各種組織，則在第三章登場。隨後第四、第五章分別討論日本時代廟宇與認同、社會事業與認同邊界的維護兩大議題，作者在這兩章討論他所研究的菁英們的認同展演，顯示台灣人族群認同的建立過程。第六章進入日本戰敗、國民政府來台灣接管的 1945 至 1947 年，這兩年是基隆港再次被改造的時期，也是台灣人、國民黨政府兩種不同對現代的與團體意識發生劇烈衝突的時期。第七章討論基隆市議會的菁英如何在聯軍轟炸、二二八事件之後小心地挪用中國民族主義論述，在當中劃界、維繫台灣人認同，以及本地人如何在重建過程中展演他們現代、城市的族群認同。

本書的強項，正是它的限制。首先，以六名在基隆的台籍、日籍菁英為研究對象，範圍清楚而明確，資料也極為紮實。但是基隆顏家的顏雲年、顏國年兄弟，能否代表日據時代的「台灣人」？以他們的言行為研究對象，能否得出「台灣人認同」是「現代而且城市」（modern and urban）的結論？顏家兄弟在基隆政界、商界稱霸之後開始建立社會事業、文化事業，他們所展演的，究竟是台灣人認同，抑或是一種日本殖民地中的漢人／中國人菁英身分？更重要的是，展演必須有受眾，他們心目中的受眾是誰，是正在試圖建立大東亞共榮

圈的日本人，還是台灣人？如果是前者，那麼維持台灣與中國的界線，可能是向日本人輸誠的姿態，這樣一來，還能不能從展演行動中推論出他們的認同？其次，作者的討論並沒有超出現有的研究成果或目前台灣學界的主流意見，亦即台灣人「在日據時代就發展出獨立於中國的族群認同」，而且有過度推論的問題。儘管作者表示自己捨棄傳統的文本分析而採用「認同展演」的取徑，但是作者的推論仍然建立於文本分析上，從六名菁英在公開場合所發表的文字記錄中尋找「台灣認同有意識地有別於中國」的蛛絲馬跡。除了日本之外，日據時期的台灣也與中國、東亞、乃至東南亞有密切頻繁的交流，顏家兄弟也曾試圖到中國發展事業。儘管顏家兄弟的「西進」以失敗收場，但是基隆港與基隆菁英並非孤立於台灣島內以及台日關係內。台灣人頻繁且靈活地進出中國、日本與東南亞，除了顏家兄弟之外，為了做生意而放棄台灣人身分的日清拉麵創辦人安藤百福也是另一個著名的例子。換言之，中國的政治、經濟變化，深刻地牽動著台灣的情勢。不將中國因素納入討論，只將基隆港與基隆菁英先放在台灣與台日關係的脈絡中，再主張台灣人認同乃是在日本時代所建立起來的有別於中國認同的族群認同，有套套邏輯之嫌。

筆者對作者在資料蒐集、比對以及敘述上所下的苦工，印象深刻；作者試圖透過「展演認同」提出關於「台灣人認同」起源的新認識，也確實讓讀者看到日據時代台灣史中的更多細節。但是，筆者認為，作者對台灣史的描繪，雖然符合當今的主流論述，卻未能讓我們認識到台灣史複雜的面貌。近年來，在創造「台灣民族」的過程中，「台灣人」與「中國人」的面貌被嚴重簡化：台灣人是既現代且善良的孤兒，被各個自稱是台灣人「祖國」的政權棄養、欺負；中國人則是落後、粗暴、玻璃心，試圖以單一、陸地的漢人霸權壓制多元、海島的台灣。但是，人從來就不是可以這樣被簡單歸類的：中國即使量體大，它的對外政策也並非只有「欺侮弱小」一種；台灣儘管小，也並非只有挨打的份。筆者在研究東亞與東南亞的過程中，接觸到中國學者對於日據時代活動於中國日本租界的「台籍民」的研究成果，以

及星馬學者關於二次大戰期間台灣人協助日本人清洗東南亞華人的研究材料。儘管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可能會受台灣學者質疑，但筆者卻認為這些研究成果是值得參考的。一方面，日據時代的台灣人是「本島人」，地位高於中國人，因此確實給了部分台灣人在日租界作威作福的空間；另一方面，台灣人能操日語、閩南語，閩南語又與潮州話接近，潮州人則是東南亞華人的大宗，對東南亞不熟悉、又因為中日戰爭而不信任華人的日本軍隊，因此仰賴有雙語優勢的台灣人在東南亞帶路、充當間諜與翻譯來清洗華人。可惜的是，作者並未呈現這些複雜、多元、豐富的面貌。對於筆者而言，這部作品更接近一位有軍方淵源的美國學者對「台灣民族」建構工程的介入與參與，而眾所皆知，區域研究是冷戰時期的產物，美國軍方與情報單位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當然，我們都知道，每一部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的書寫從來不是單純的對過去的還原，但是呈現出好的與壞的元素、符合主流價值與政治不正確的圖像，仍然是史學家的工作。這部大部頭的作品呈現的圖像深入卻單一，殊為可惜。